

欧洲政治与国际关系丛书

王学玉 主编



跨大西洋安全关系的制度化： 从理性选择到社会建构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ransatlantic Security Relations:
From Rational Choice to Social Construction**

李海龙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欧洲政治与国际关系丛书

王学玉 主编



跨大西洋安全关系的制度化： 从理性选择到社会建构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ransatlantic Security Relations:
From Rational Choice to Social Construction**

李海龙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大西洋安全关系的制度化:从理性选择到社会建构/李海龙
著. —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7-5607-4606-7

I. ①跨…

II. ①李…

III. ①国际问题—安全—研究

IV. ①D8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43449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济南景升印业有限公司印刷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20.25 印张 320 千字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8.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总 序

欧洲一体化是现代社会跨国交流与联系中最具有政治价值的一种集体行动的选择和进程,它在欧洲地区逐渐创造出了对欧洲与世界有着深远意义的两种新体制:欧盟政体和欧洲国际关系模式。欧洲的变化不仅塑造了欧洲政治与社会的版图,为世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也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人类活动组织原则和价值的认知与偏好,给思想界思考人类可能的选择和未来的前景带来了有一定程度的可验证性的启发与参照。

政体是为了某种价值的满足而动员民众及其资源的能力,它一般需要一定程度的制度化和等级。制度化表明组织机构发挥作用和较高社会政治秩序的存在,等级意味着权力集中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意识形态和认同。欧洲一体化以及由此创造出的欧盟政体从它们的开端就是为了实现一个和平、稳定、自由和富裕的欧洲这个崇高的价值,尽管有客观的挑战、主观的迟疑以及不可避免的波折,许多传统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都归顺和满足了这种价值的需要,在它的实现过程中逐渐赋予了欧洲共同体及其身后的欧盟以基本的合法性,从而使其拥有了较大的政治威权以及组织与制度能力,成为包括政治社会秩序在内的欧洲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之一,成为欧洲与世界事务中一个很有影响的角色,也越来越多地获得了来自其内部以及外部世界的认同。在这个政体中,权力出现了新的集中,在国家之上有了新的威权存在,因此具有了超国家的特征和职能,但超国家性

并不是欧盟政体的全部。价值是多元的，也是分层的，民族国家所代表的价值及其动员能力在现有条件下是不可替代的，对其认同的基础依然牢固。这样，在欧盟政体中就产生了两种政府间关系——水平的成员国间关系和垂直的超国家威权与成员国间关系，伴随着一种议会间的关系——欧洲议会与成员国议会的垂直关系。更加复杂的是，随着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围绕着欧盟，各种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以及利益集团的跨国性与欧洲化的特征日渐加强，民众与超国家威权之间也有了许多的直接联系和互动。欧盟政体是在一个多维度与多棱角的脉络中运转的。

欧洲一体化因此产生了许多具有变革意义的政治理论问题。长久以来争论不休的主权从国家向欧盟的转变自不必说，其他脱离成员国的诸如欧洲公民与市民社会、欧洲政党与代议制、欧洲认同与合法性、超国家威权的责任、欧洲的政策空间、制度与组织结构、民主与欧盟及其机构的能力等概念或者问题，构成了欧盟政体建设与完善中的重要因素，都在颠覆着传统的政治理论，突显了重新界定国家与欧盟关系的必要性。所有这些因素都指向一个问题，即欧盟如何治理？欧盟是一个独特的政体，一个多中心的治理体系，包括那些分散的相对自主的欧盟机构、成员国、跨欧洲的社会力量与利益集团、受欧盟政策影响或者具有欧洲视野的成员国内部力量以及欧洲民众，都在不同的治理层次上参与或者影响欧洲政治的运转以及决策。治理的原则要依据欧洲民众与力量对欧盟的需要而定：一个问题解决(problem-solving)的欧盟，一个规范(normative)的欧盟，或者一个权利保障(right-based)的欧盟。治理的机制主要有两种：超国家的制度与政府间的谈判，因为只有欧盟机构与成员国政府才有资源和能力解决需要治理的问题，当然除它们之外的其他角色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如何利用这些资源以及以何种方式进行治理。上述涉及到的诸多方面主要还是政治问题，但欧盟及其治理已经越来越多地进入到了欧洲公共政策领域，在政治共

同体的基础上开始出现一个政策共同体。

欧洲一体化进程极大地丰富了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尽管许多人从超国家主义和联邦主义的视角解读欧洲一体化与欧盟的运转,我们也不能否认欧洲有在某一天实现联邦制的可能性,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欧盟在本质上依然是一个国家的体系。无政府状态是国家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在欧洲无政府却得到了很好的管理,出现了一个“成熟的无政府”国家体系。安全困境也基本上得以消除,安全共同体是目前欧洲的主要秩序。这些都要归于欧洲一体化所导致的欧洲体系与结构的变革,就是这个进程把欧洲与其成员国关系推进到一个相互塑造的良性互动之中。欧洲的经历有助于我们回答国际关系中的许多关键性问题,如国际体系与行为体是何种关系以及如何互动,国家间的合作以及国际制度的理性与社会性作用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如何推动国际制度的发展与变革,如何管理相互依存关系,如何解决国家间的争执与冲突,稳定的和平与安全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和方式能够较为理想地实现,地区一体化如何成为可能,地区政治有什么样的动力与特征,等等。应该有理由得出判断,今天欧洲地区政治的现实是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国际关系能够达到的最好的可能性。

与一体化的深化和扩大相适应,欧盟在全球政治、经济与安全领域的影响也是逐步增强,成为国际体系发展与变革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也正如对欧盟政体及其性质难以进行清晰的界定一样,在其国际身份与角色的认识上也充满了争论:军事的(与北约重叠)、经济的,抑或是规范的力量。根据2003年的安全战略文件,欧盟的国际目标是致力于创建一个强大的国际社会,一个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国际组织以及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表明,欧盟自身将其国际影响的资源认定为欧洲的软力量方面,努力通过其发展与治理模式,通过其占据的国际规范与道义制高点,并借助其国际谈判与强制能力,首先是确立起国

际关系行为的典范，然后试图在全球推而广之。欧盟内部运作的多边性、治理实践以及可持续的发展理念，使得它在国际事务的参与中具有鲜明的多边主义、多元主义、民本主义以及普世主义，体现在从传统到非传统的所有重要的国际领域，无论是在全球治理、地区间关系，还是在处理大国关系等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中。但是，一个不容逃避的问题是，当规范界定的利益与经济等物质界定的利益发生矛盾时，当欧盟的规范力量遭遇到其他国家的经济等物质力量的挑战时，欧盟会如何进行选择或者应对？

山东大学欧洲研究中心自 1994 年成立以来，就一直将欧洲一体化与欧洲政治作为研究和教学的重点，坚持从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学的视角出发探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那些具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注重基础理论研究以及比较研究，如欧洲政治秩序的转变、欧洲一体化理论、欧洲政党与政治思潮、欧盟治理与社会政策、欧盟与国际体系的变化、欧洲一体化与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地区安全与地区合作的国际比较等。欧盟—中国欧洲研究中心项目为山东大学欧洲研究中心的学术研究、研究生培养、国际交流以及学术出版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对中心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欧洲政治与国际关系丛书是中心学者近年来研究成果的展示，以此与欧洲及国际关系研究学界进行交流。

王学玉

2009 年 5 月于济南燕子山庄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节 选题依据与研究意义	(1)
第二节 相关研究综述	(4)
第三节 理论预设	(13)
第四节 研究框架	(25)
本章小结	(29)
第一章 国际制度与制度化动力	(31)
第一节 国际制度研究	(32)
第二节 制度化概论	(34)
第三节 制度化的动力	(39)
第四节 理性选择和社会建构各自的优缺点	(67)
第五节 两种动力的融合	(76)
本章小结	(97)
第二章 战略性社会建构动力下的制度化	(100)
第一节 战略性社会建构动力分析	(102)
第二节 战略性社会建构制度化的过程	(108)
本章小结	(117)
第三章 冷战时期跨大西洋安全关系的制度化	(120)
第一节 二战后欧美的安全环境	(121)

第二节	欧美制度化动力分析·····	(122)
第三节	欧美安全领域制度化建设·····	(141)
第四节	欧美安全制度共同体的建立·····	(159)
第五节	欧美制度化影响·····	(171)
本章小结	·····	(173)
第四章	冷战后跨大西洋安全关系的制度化·····	(176)
第一节	冷战后欧美安全环境的变化·····	(177)
第二节	欧美安全领域制度化的改造和扩大·····	(184)
第三节	欧美制度化的理性选择因素·····	(206)
第四节	欧美制度化的社会建构因素·····	(229)
第五节	两种因素对制度化的融合性影响·····	(238)
第六节	欧美制度化与国家学习互动关系·····	(247)
本章小结	·····	(251)
第五章	未来欧美安全关系瞻望·····	(255)
第一节	欧美安全关系的未来·····	(255)
第二节	欧美安全制度的扩大趋势·····	(269)
本章小结	·····	(276)
第六章	总 结·····	(281)
主要参考文献	·····	(302)
后 记	·····	(314)

导 论

第一节 选题依据与研究意义

自古至今,综观中外,在世界性变动之后,每一个新出现的大国(powerful nation)都会面临一个挑战或是机遇,那就是如何以一种合适的方式建立国际秩序并为其他国家接受。其核心问题就是国家会作出何种战略选择,以何种方式处理新的权力模式的变更。战争摧毁了旧有的国际秩序,打乱了既往的权力安排,各方都要求建立新的地区和国际秩序来稳定国际形势,获取新的权力优势的国家必须采取战略来处理这个核心问题。面对获取“意外权力”(windfall)的情况,新的大国有三种选择:第一,统治(dominate):利用掌握的物质权力来确立新的秩序并获取利益。第二,放弃(abandon):放任战后的世界混乱,集中精力打理本国的事务。第三,转化(transform):将战后获得的权力优势转化成为一个稳定的秩序。^①从近代国际关系历史的发展来看,第三种模式的痕迹越来越明显。当然,对于第三个选择,新的大国不仅需要处理战后的混乱情况,扶植失败国家,而且还要使后者相信,它也不会剥削或放弃这些战败国。对于转化战略,制度化就是一个常用方式,历史也多有例证。

1815年的卡斯尔雷子爵(Viscount Castlereagh)、1919年的威尔逊、1945年的杜鲁门都采取了这种措施。^②尤其是二战之后,美国针对欧洲

^① Jan Hallenberg and Hakan Karlsson (eds.), *Changing Transatlantic Security Relations*,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6, p. 4.

^② G.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reface.

采取的第三种策略,利用欧美制度化的方式来建立联盟关系,就是一个典范。这种制度化的结果至今维持,其程度也越来越深厚。欧美关系^①对未来时期的国际安全和贸易有重要的影响,其安全领域的合作与发展更是具有深远意义。可以说,准确把握欧美安全关系发展的脉络是理解冷战后乃至 21 世纪国际政治的一把钥匙。^②

为何选择欧美安全领域的制度化作为研究对象?国家的安全领域涉及到国家的生存之本,是国家最不容易作出让步的领域。历史上国家间的冲突并不少见,安全领域中国家之间的结盟与背叛更是一个常态。^③但是,反观二战后的欧美,在安全领域的制度建设方面,是世界上制度化最为完善和稳定的地区。同倾向于双边条约、比较松散的东亚制度化发展相比,美国与西欧建立的是一种多边主义、正式化程度比较高的制度网络。^④从一定程度上而言,欧美安全关系的发展史就是一个制度化的历史。冷战期间,欧美联盟以应对内外双重威胁为动力而开始发展,以北大西洋公约为主体,辅助以其他的安全制度,建立了一个完善的制度网络。随着欧美关系的发展,经过双方复杂和密集的社会交往,欧美间制度化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制度化的动力从单纯的对共同安全的追求和国家利益的追逐,到逐渐浓厚的社会建构,更多的因素尤其是社会因素被包含在内,其作用也愈加明显。这其中理性选择和社会建构因素的双重动力推

① “欧洲”这个词语有很多所指,如西欧、欧洲整体、欧盟、美国在北约中的欧洲盟友、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的地区等等。这些含义涉及两个问题:第一,“欧洲”包含哪些国家和地区?第二,欧洲是不是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就欧美关系而言,它包含多重关系:(1)多边关系——美、德、法、英等国家间的关系;(2)双边关系——美国同西欧或者欧盟整体;(3)另外一层双边关系——美国同单个欧洲国家的关系。本书所指的“欧洲”分为两个时期:(1)冷战时期是指同苏联集团相对应的西欧部分,主要是北约内的欧洲国家。(2)冷战之后,则主要包含欧盟与北约的成员国。因为在欧美制度化的过程中,大西洋东岸方面主要是美国在发挥主导作用。因此,欧美关系可以等同于跨大西洋关系。(Anssi Paasi,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Region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Emergence of Regions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Regional Identity,” *Fennia*, Vol. 164, No. 1, 1986)

② Jan Hallenberg and Hakan Karlsson (eds.), *Changing Transatlantic Security Relations*,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6, Preface.

③ 参见秦亚青主编《理性与国际合作: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8 页;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1995.

④ 参见[加]阿米塔·阿查亚《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王正毅、冯怀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7、42 页。

动了欧美制度化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向复杂的发展,形成了一个综合的战略性社会建构动力。

冷战之后,同新现实主义的预测^①相反,欧美制度化非但没有衰落,反而经历了一个改革与扩大的过程。在新的时期下,北约依然发挥了一个“稳定器”的作用,给成员国带来制度化的保障。^② 面对新的问题、新的形势、新的挑战,欧美双方在原有制度化的基础上,继续保持紧密的关系,并对原有的制度化网络进行改革,这对欧美乃至全世界的未来安全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欧美之间制度化发展是国际制度建设的典型代表,其中很多东西对于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和调整具有深远的启发意义,值得世界各国认真学习。

最后,本书将制度化动力及其转化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从国际社会发展的现实来看,为什么国家在某个特定的问题领域中愿意选择某一种特定形式的制度安排?为什么国家有时为了加入某个正式的国际制度而愿意放弃或移交部分行动自由乃至部分主权,有时却为了保持自己的行动自由而拒绝加入或违背国际制度?为什么国家有时愿意签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有时却选择达成不具有约束力的非正式协议?为什么有的国家试图强化制度安排的超国家性质,而有的国家力图保持它的政府间特点?为何有的制度化能够维持相当一段时间,而有的制度化则仅

① John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of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4, 1990; Kenneth Waltz,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2, 1993; Pierre Hassner, "Europe beyond Partition and Unity: Disintegration or Reconstruct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6, No. 3, 1990; Hugh DeSantis, "The Grating of NATO,"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14, 1989; Christopher Layne, "Superpower Disengagement," *Foreign Policy*, No. 78, Spring 1990; Stephen Walt, "The Ties That Fray: Why Europe and America Are Drifting Apart," *National Interest*, No. 54, Winter 1998/1999; Robert Gilpin, "American Policy in the Post-Reagan Era," *Daedalus*, Vol. 116, No. 3, 1987;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Micheal Mastanduno, "Preserving the Unipolar Moment: Realist Theories and U. S. Grand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4, 1997; G. W. Grayson, *Strange Bedfellows: NATO Marches East*, Lanham, N. Y.: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9.

② John Duffield, "NATO's Function after the Cold Wa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99, No. 5, 1994/1995.

仅昙花一现?这些都是值得国际政治专业学者们探讨的问题。其核心问题是何谓制度化的动力以及制度化动力是如何变化的,进而对国家的行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从跨大西洋安全关系的制度化进程来看,欧美双方以理性计算为出发点,辅助以部分社会建构因素,构建了以北约为主导的制度化网络。在此基础上,欧美双方间的社会化交往越来越密集,将越来越多的社会性因素纳入制度化进程中,推动跨大西洋安全关系的制度化向更高层次发展,并逐步具备了一种“宪政主义制度化”特点。因此,对欧美制度化的动力及其转变进行研究,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

本书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借鉴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尝试将物质的方法和社会的方法结合起来去理解国际政治,考察国家行为体制度化的动力和影响,从而分析当代欧美关系的变革与发展,探讨两者关系从理性选择到社会建构发展的转化,并对欧美未来关系作出判断。希望此研究成果能有助于我们对欧美关系作出正确的判断,并对其他国家参与国际制度化进程给予启迪。

第二节 相关研究综述

国内外有关跨大西洋安全关系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众多学者利用不同理论从各个角度对其展开分析,给予我们很多启迪。

一、国内相关研究现状

由于欧美关系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国内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早,主要形式是论文,也有部分专著。由于北约在欧美安全关系中的重要性所在,很多研究的重点放在北约上,例如《为了谁的安全:北约军事战略大透视》一书以北约为核心,分析了跨大西洋关系的历史和当代发展。作者认为,北约作为冷战的产物,随着冷战的结束早就该收进历史的“回收站”。但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国家却企图通过“调整”、“改造”,使之继续保留,并进一步强化,把它作为推行其霸权性全球战略的工具。^①因此,该书主要从理性选择的角度对欧美联盟展开论述,认为欧美联盟建立和维持的动力主要来自双方对权力和利益的追逐和保护。

① 参见王美权《为了谁的安全:北约军事战略大透视》,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还有的研究以欧洲一体化为背景,对美国因素进行分析,将欧美制度的影响包含在内。例如《世界的防线:欧洲安全与国际政治》一书,以欧洲安全为着眼点,分析了新时代跨大西洋安全关系的发展。其重点是冷战后欧美双方对彼此的现实需求,综合分析了欧美联盟的现实影响与象征意义。^①而在《解读美欧——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美欧关系》一书中,作者以全球化为背景,以欧洲一体化为主线,论述了欧美关系的历史和现状。作者认为,欧美矛盾是机制性的矛盾,而非根本性的矛盾,这取决于双方在经济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以及对未来合作的期待和对未来威胁的认同。^②

部分专著以美国为主题,包含对欧美制度化的论述。其中,门洪华博士于2005年出版了题为《霸权之翼:美国国际制度战略》的专著,对美国的制度战略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作者认为,构成美国的大战略实力基础的核心因素包括国家实力、战略观念和国际制度。现存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国际制度对美国基本是有利可图的,通过制度网络的影响,美国可以弥补自身的权力缺陷,促进霸权护持。美国霸权战略的成功之处在于,通过国际制度网络来创造一个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合作体系,这个体系以美国为中心,以美洲为基础,以欧美制度化为框架,将欧亚大陆裹挟其中。^③

国内有关跨大西洋关系的论文更是数不胜数。因为篇幅的原因,大部分论文选取欧美关系的一个方面或某一时段进行阐述。其中,欧美关系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是研究比重最大的部分。例如,冯仲平教授认为,安全是欧美同盟关系的核心。欧洲对美国在安全上的依赖程度决定了欧洲外交的空间大小,同时也决定了欧美同盟内部关系的模式。欧洲对冷战后新安全威胁性质的评估,使其一方面意识到自身对国际安全的责任,另一方面则使其认识到美国合作的不可取代性。基于这一判断,欧洲一方面努力改善因伊拉克战争受到损害的对美关系,另一方面寻求建立能够反映新安全形势的新型跨大西洋关系。这个目标的达成将主要取决于欧洲今后在国际安全事务中所能发挥作用的大小。^④

① 参见肖元恺《世界的防线:欧洲安全与国际政治》,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② 参见叶江等编《解读美欧——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美欧关系》,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③ 参见门洪华《霸权之翼:美国国际制度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④ 参见冯仲平《欧洲安全观与欧美关系》,载《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冯仲平《欧美关系:“合而不同”——析伊拉克战争对欧美关系的影响》,载《国家安全通讯》2003年第7期。

在跨大西洋关系的未来发展方面,众多学者作出了各种预测。^① 大部分学者认为,未来的欧美关系将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合作关系。欧美矛盾总体上是一种西方阵营内部的竞争和争吵,彼此的合作依然大于对抗,双方将在大协调、小摩擦的基本框架下继续进行新一轮的互动。^② 其中,连玉如以世界秩序的调整为主线,认为在世界新秩序目标的设定上、原有各大力量相互关系的调整上、现存国际组织与程序的改革和演进上还存在很多未知数,21世纪世界新秩序的建立仍是当前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这对欧美关系的调整增加了更多的变量。^③ 总之,这些预测大部分建立在双方对理性的国际问题的考虑的基础上,认为现实问题决定欧美双方必须合作。跨大西洋关系的走向是,双方从一个从属的关系向平等关系的转化,这可能会带来一些政策上的冲突,而且双方在现实操作手段的分歧会导致双方产生矛盾。

总之,这些成果为后人研究跨大西洋关系提供了各种思路和启示。但在这些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其中比较明显的缺陷就是国内的研究大多数偏重史实的描叙而短于理论应用。而论文的形式,则多数是就某一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很难给人们以宏观的印象。这些问题使国内的欧美研究的水平停留在一个注重描述的水平,而未能向一个理论化、宏观化的水平发展。

就国际制度的研究,国内学者给予的注意力越来越多。例如何俊志、薛晓源、陈家刚等学者翻译了大量国外制度主义理论研究的成果。^④ 这为我们了解和使用制度主义理论提供了便利。田野利用制度主义理论,从一个交易成本计算的角度,建立起精密的分析模式,对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持作了分析。^⑤ 很多学者利用论文的形式对国际制度的定义、影响、

① 参见黄飞君《跨大西洋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载《领导文萃》2005年第3期;匡国栋《新大西洋关系若隐若现》,载《瞭望》2004年第27期。

② 参见孔继萍《欧美关系的现状及发展》,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③ 参见连玉如《浅论21世纪世界新秩序与欧美关系调整》,载《国际政治研究》2003年第4期。

④ 参见何俊志等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薛晓源、陈家刚等《全球化与新制度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⑤ 参见田野《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一种交易成本的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制约因素、合法性等方面作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①但是,大多数国际制度的研究放在了理论的层面上,也就是注重对国外国际制度理论的介绍和比较,鲜有学者提出自己的观点或利用理论来分析现实问题,从而使制度研究陷入一个理论和现实脱节的问题之中。

二、国外相关研究现状

由于得天独厚的条件,国外尤其是欧美地区对跨大西洋关系的研究非常密集,尤其是北约建立后有关欧美关系的研究成果更加丰富。最初的研究如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的《政治共同体与北大西洋地区》,作者通过多个历史案例的比较研究发现,决策者的价值观的相互包容是多元安全共同体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而种族差别或语言差别的加剧则往往导致政治共同体的解体。从这个角度,作者认为跨大西洋联盟不仅仅是一个安全同盟,而更大的程度上是一个基于共同观念的政治共同体。^②这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考途径,而且欧美联盟的发展的确呈现出安全共同体的明显特征,印证了多伊奇的观点。

有关跨大西洋关系的论文和专著更是汗牛充栋。这些研究成果从各个角度对跨大西洋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而且国外的研究成果大都长于理论的应用。^③从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到科学行为主义理论,从新现实主义理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到两者结合的理性主义,再到建构主义理

① 参见范菊华《规范与国际制度安排:一种建构主义阐释》,载《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10期;陈晓进《“国际制度”概念辨析》,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李晓燕《从“合作”到“和谐”:国际制度的作用趋向》,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隋新民《国际制度的合法性与有效性——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三种范式比较》,载《学术探索》2004年第6期;田野《国际制度的形式选择:一个基于国家间交易成本的模型》,载《经济研究》2005年第7期;张琦《权力、制度、认同——国际秩序的新理解》,载《德州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此外,还有很多有关国际制度理论的研究,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② Karl W. Deutsch, et al.,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③ Frank R. Douglas, *The United States, NATO, and a New Multilateral Relationship*,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Inc., 2008; Gustav Lindstrom (ed.), *Shift and Rift: Assessing US-EU Relations after Iraq*, published by the EU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2003; Jan Hal-
lenberg and Hakan Karlsson (eds.), *Changing Transatlantic Security Relations*,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6; Roland Dannreuther and John Peterson, *Security Strategy and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Routledge: Taylor & John Francis'Group, 2006.

论,理论思想层出不穷。例如,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罗伯特·阿特认为,在新的形势下美国应该选择“选择性干预战略”,避免野心过大和过于单边主义,而这种战略下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国际制度网络的建设。^①

从一定程度而言,跨大西洋关系的发展就是一个国际制度建设的过程。但是,纵观中外研究,有关跨大西洋关系的研究,鲜有成果用制度主义理论对此过程进行分析。即使有的研究成果从制度化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但就欧美制度化的动力而言,这些研究往往具有一定的偏颇性。这种研究主要分为理性选择和社会建构两类,大部分研究将注意力放到制度建设的理性选择动力之上。就北约的存废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其存在基于对现实挑战的应对,例如对俄罗斯的畏惧和对东欧国家混乱局面的预防等。^②从美国角度来看,美国之所以比欧洲更加重视制度化,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美国把北约看作是获取欧洲支持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③

还有学者认为,冷战时期欧美借助北约等国际制度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通用财产(general assets),如政治协商、决策制定、军事部署、合作以及实施。进入20世纪90年代,新的安全问题出现,但北约凭借着通用财产,依然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而且,北约还针对新的形势建立了大量新的制度和组织,例如新的军事演习,北约的透明化、联合化、超国家防务体系的文官化和民主化控制等,这些都是在冷战时期北约实践基础上建立而成,共同推动了欧美制度化的继续发展。^④有的学者分析了欧美的内部和外部威胁,进而论述了冷战后北约存在的必然性。外部功能主要是遏制俄罗斯和新威胁,控制中东欧并控制前苏联地区的不稳定情况。内部功能则是平息各国对德国统一和发展的畏惧感,使德国的力量表现出

① 参见[美]罗伯特·阿特《美国大战略》,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Charles Glaser, "Why NATO Is Still Best: Future Security Arrangements for Europ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1, 1993.

③ *Transatlantic Transformation: Building a NATO-EU Security Architecture*, Washington, D. C.: Atlantic Council of the U. S., March 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acus.org/docs/0603-Transatlantic_Transformation.pdf; Daniel S. Hamilton (ed.), *Transatlantic Transformation: Equipping NATO for the 21st Century*, Washington, D. C.: Center for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2004.

④ Ronald D. Asmus, "New Plumbing, New Purposes—Rebuilding the Transatlantic Alliance," *American Interest*, November/December 2008; Simon Serfaty (ed.), *A Recast Partnership? Institutional Dimensions of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Washington, D. C.: CSIS, 2008; Celeste A. Wallander, "Institutional Assets and Adaptability: NATO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4, No. 4, 2000.